

全球化领域的权威

本文中，普拉卡什·隆加尼介绍了研究全球化前途和危机的早期学者——特拉维夫大学的阿萨夫·拉钦

1958年，17岁的阿萨夫·拉钦（Assaf Razin）在以色列军队服役时，因友军炮火误伤险些丧命。一年的住院经历表明，在沙米尔集体农庄（Kibbutz Shamir）的劳动生活并不适合他。沙米尔集体农庄是拉钦的家乡——戈兰高地山坡上的一处社区。他曾写道自己“转而投向了全球化的现代世界，这个世界为许多人提供了非凡的机遇”。对他而言，这个世界就是他读研究生的芝加哥大学。此后，针对各国应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化这一课题，拉钦作为代表人物开启了一段耀眼的职业生涯。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拉尔斯·斯文森（Lars Svensson）曾说，有了特拉维夫大学这个安全的大本营，拉钦在世界各地的机构中都是“最受欢迎的座上宾之一”。2017年，拉钦被授予以色列最高奖项EMET奖，以表彰其“在学术和专业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并做出重大贡献”。

“所以，我受伤这件事虽然不幸，但看来是福祸相依。”拉钦这么说的时，展现出他的亲朋好友口中的“典型的阿萨夫”特质：从不纠结于个人的悲剧，而是坚定地向前走，履行自己的义务。马克思主义理想在以色列集体农庄“基布兹”中占据统治地位——而拉钦的父亲作为基布兹的创始人之一，当初在伦敦时曾特意拜访过卡尔·马克思的墓地——后来在拉钦受伤后，基布兹的长老们认为他在希伯来大学学习农业专业知识来为社区提供服务，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拉钦却迷上了经济学，并在导师的大力推荐下，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用于继续攻读研究生。芝加哥大学在当时和现在一样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圣殿。

“从马克思主义公社到资本主义的芝加哥，再到事业上的巨大成就，同时又能做到谦逊并乐于助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历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部副主任乔纳森·奥斯特里（Jonathan Ostry）如此评论到。他从上世纪80年代在芝加哥读研究生时就认识了拉钦。奥斯特里与现任IMF副主任的汤姆·克鲁格（Tom Krueger）一起为拉钦1987年出版的名作《财政政策与世界经济》撰写了配套指南。奥斯特里说，由于汇率弹性、资本流动性增加，国际经济学的世界日新月异，“本书就是为国际经济学界导航的

必备指南”。各国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正变得“无比复杂”，奥斯特里说，“有一些复杂的思维脉络，当初清晰地呈现在阿萨夫的大脑和书籍中，而现在，我们要求助于计算机模拟来了解它们。”

前景与危机

这本书是与后来任IMF首席经济学家的雅各布·弗伦克尔（Jacob Frenkel）共同撰写的，其中带着拉钦的工作烙印——它阐述了全球化的前景与危机，即世界上各个国家不仅被国际贸易绑定，还被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境流动联系在一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学家阿蒂什·戈什（Atish Ghosh）认为，为了追踪一体化世界的联系脉络，拉钦和他的合著者们常常不得不跨越经济学领域的边界，这提高了工作的实用价值。“政策问题并不是整齐划一地归属于某一个经济学门类。而阿萨夫和他的合著者在某一个十年中研究的课题，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似乎或多或少会成为政策热点问题。”戈什说。

拉钦与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当时在特拉维夫大学，现就职于哈佛大学）一起研究了资本流动如何影响国际贸易模式。谈到二人于1978年出版的《关于不确定条件下国际贸易的理论》一书，赫尔普曼称该书的特点在于，它是为打破国际贸易（被认为是微观经济学的一部分）和资本流动（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之间的割裂式研究的一次早期尝试。他说：“单独对贸易和宏观经济进行思考是愚蠢的。”该书对二者开展了综合研究，指出由于资本流动，各个国家间在更大程度上分担了风险，这反过来使贸易更加专业化，从而对生产力有利。但是，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导致更高的相互依存度。也就意味着，当全球体系出现裂痕时，比如因为金融危机或主要国家的政治动荡而受到扰动时，各国会变得更加脆弱。在随后的工作中，拉钦与其他作者继续深入研究了这一主题。经济学家曾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等某些类型的资本流动相比“热钱”（短期投资组合资本流动）等其他类型的资本流动，会带来更大的利益。而拉钦等人在这方面的工作则对此进行了检验。

20世纪80年代，拉钦与弗伦克尔的研究讨论了在一个一体化的世界里，一个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选择是如何影响和制约其他国家的政策选择的——用今天的行话说，这就是政策“溢出效应”。各国政府竭尽全力地守护着各自征税和支出的独立性，但为了从全球化中受益，政府必须放弃部分宝贵的主权。戈什说：“在资本流动的世界中，各国必须就财政政策开展协调，这具有重大意义。”他注意到，在许多政策辩论中都涉及到这个主题。事实上，这正是欧盟国家现在正在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些国家正在寻求达成多种财政规则，一旦各国将经济完全统一在单一资本市场下，这些规则就会取得成功。

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

20世纪90年代，拉钦一方面研究资本和劳动力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研究税收和福利制度。拉钦与特拉维夫的另一位同事艾弗莱姆·萨德卡（Efraim Sadka）共同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虽然资本的流动对国家有利，但试图通过降低税收来吸引外国资本可能会导致“逐底竞争”；较低的税收会使政府无法提供社会所需的公共服务。各国通过税收优惠来争夺外国资本，导致许多人对外国资本如何服务于公共福祉产生质疑，拉钦对该课题的早期工作已经突显出其重要性。

凭借在资本流动的收益和成本方面的工作，拉钦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受欢迎的客人。经历1994年的墨西哥“龙舌兰酒危机”后，人们担心其他国家也会面临风险。此前，经济学家们只用简单的规则对脆弱性做出判定，比如经常账户逆差（非常类似于贸易逆差）超过一国收入的5%-6%。但随着各国对外国资本利用，似乎只要这些国家能让外国投资者对其有信心，它们就可以容忍更高的经常账户逆差。

拉钦曾与最近退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主任吉安·玛丽亚·米莱西·费雷蒂（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合作，了解经常账户赤字什么时候有可能突然逆转。他们考察了外汇储备较低或贸易条件恶化等因素。此前拉钦曾与拉尔斯·斯文森一起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以了解资本流动时，微观基础下的贸易条件变化与经常账

户之间的联系。拉钦说：“我与斯坦·费舍尔（Stan Fischer，当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有过多次交流。费舍尔明白，不论我从理论工作中获得多少见解，也不论吉安·玛丽亚的数据工作有多么努力，都很难准确预测某些国家什么时候会突然面临逆转和危机。”的确，1997—1998年亚洲一些经济体的经常账户逆转时间是难以预测的，这已得到证明，要找到可靠的预警系统仍然遥遥无期。

拉钦的研究还对劳动力流动和福利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了预警，这在当今的美国和欧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欧美，“福利购物”——即移民前往福利水平较高的国家来利用其慷慨的福利制度的行为——经常成为民粹主义者指责移民的矛头。

胜利背后的悲剧

这项研究活动和对政策问题的深入挖掘具有重大意义，而这却是在一起个人悲剧的背景下进行的。他就是拉钦的儿子奥法尔（Ofair）——在勇敢对抗渐进性的多发性硬化症后仍于1996年去世，年仅30岁。奥法尔体现了父亲的顽强精神，在去世前的几天，他成功地完成了乔治城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论文。拉钦说，在得到消息后，他在前往华盛顿特区的长途飞机上已泣不成声，但为了避免打扰别人，他只能“偷偷摸摸”地哭。

为纪念奥法尔，拉钦设立了乔治城经济学研究生最佳研究论文奖，并创办系列讲座，他本人和他的儿子罗尼（现为伦敦经济学院教授）都曾在讲座上发言。来自业界的精英演讲者还包括斯坦利·费舍尔（Stanley Fischer）、塞西莉亚·罗斯（Cecilia Rouse）、杰夫·萨克斯（Jeff Sachs）、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克鲁格曼曾将这个一年一度的活动称为拉钦众多崇拜者的“家庭团聚”。

2001年，拉钦的60岁生日庆典吸引了业内领先的国际经济学家来到特拉维夫——包括克鲁格曼和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回想庆典上受到的赞誉，拉钦开玩笑说，他希望自己的父母也能到场，“要

是我父亲听到这些赞美，他会很开心，而我的母亲会相信所有的赞美。”他说自己并没有打算退休，只是在“度过新学期之前的美好假期”。拉钦说到做到，在过去的20年里，他一直非常活跃，在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项目中任教（于2016年退休），这样在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还出版了几本书，其中一本书分析了以色列如何利用全球化，广受读者好评。


数十年来，拉钦始终密切关注以色列的经济形势并进行相关写作。他将自己的观点整理成了2018年出版的《以色列与世界经济》一书。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拉钦的研究合作伙伴菲利普·斯瓦格尔（Phillip Swagel）称赞该书清晰地阐述了为什么其他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遇到了问题，而以色列却获得了成功”。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的是，以色列能够引导大批外国资本流向国内的成长型产业——高科技领域的创业公司。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本着有助于国家高科技行业和整体增长的原则，从前苏联吸收了100万移民，这大约占该国人口的20%。但斯瓦格尔也提到“拉钦对全球化潜在的陷阱直言不讳”，这些陷阱包括以色列国内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这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最高水平。

成功的秘诀

今年，拉钦将年满八十岁。他一如往常得选择用一本新书来纪念这一时刻，书中讲述了在经历了民粹主义和新冠疫情的挫折后，全球化将如何重回正轨。在接受《金融与发展》采访时，拉钦将自己事业的成功归功于“有幸被优秀的人所包围……同时发现和坚持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在芝加哥，他的教授包括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等，而他的同学后来也成为国际金融界的名人，包括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 Dornbusch），还有后来双双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弗伦克尔（Frenkel）和迈克尔·穆萨（Michael Mussa）。拉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明尼苏达大学，他说自己“从最优秀的人才那里学到了‘GE’（一般均衡）——因为在芝加哥没有教过这个理论”。所谓“一般均衡”

研究的是组成一个经济体的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往往会产生一些通过单独研究一个部门的运作（“局部均衡”）所无法得到的见解。从当时还在明尼苏达州任教、“一生的朋友和影响者”克鲁格那里，拉钦了解到将理论应用于数据的重要性。

在其他方面的工作经历使他确信自己最为适合学术。他时不时地会在特拉维夫大学从事行政工作，但他说这些工作“从来都不是自己的长项”。拉钦也不热衷于政府工作。1979年，他被任命到以色列财政部的一个高层职位。当时的政府大肆消费，不仅助长了通货膨胀，还有可能使以色列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由于公开警告说必须扭转政策走向，导致拉钦在上任仅六个月后就被罢免。“这就好比马蒂（马丁·费尔德斯坦）在里根时代非得离任不可，因为他对赤字的危险提出了警告，”拉钦说。短暂的政府任职经历让他相信，“学术生活才是我的比较优势”。

虽已置身政府之外，但拉钦仍会就以色列的形势积极发表评论。他的脑海“始终萦绕”着以色列与其邻国之间的和平前景。“和平不会在我的时代到来，而会在我子孙后代的时代到来”，他已接受了这种预测。他告诫说，重要的是不要放弃世界会更好的希望，无论这看起来多么乌托邦。同时他还引用了小孙子的一首诗的尾句：“乌托邦王国，是隐藏在冷漠世界中的希望”。

普拉卡什·隆加尼（PRAKASH LOUNGANI）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独立评估办公室的助理主任。

2009年，教室中的阿萨夫·拉钦。